第一章

政治文化的内涵、特性及其比较研究的意义

对任何事物的科学研究，都需要运用比较的方法，从此事物与彼事物的联系与区别中，认识事物的面貌、性质、特征。政治文化历史传统的研究也需要这样。比较总要把握一定的标准和尺度，不是只靠经验的对比能够奏效的。这个一定的标准和尺度，就是基于自然与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规律性总结概括的理性、理论原则。因此，我们首先来说明政治文化的内涵和特性，同时简及于我们面对的这个课题的比较研究的意义。

一、政治文化的内涵

1. 20 世纪的政治文化研究热

政治文化的科学研究，始创于 19 世纪中叶以来马克思主义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对法国、德国农民政治心理分析； 20 世纪初，列宁在领导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提出了“政治文化”的概念，主要与国民教育中的政治教育相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是美国的一批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兴起了把政治文化作为一个独辟领域进行研究的热潮；到 20 世纪 80～90 年代，政治文化在中国也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并与民主政治建设关联到一起。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政治文化专论，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分别对法国农民和德国农民的政治心理趋向和特征作过深刻而生动的分析，特别指出了他们的最高权力崇拜心理的集中表现“拿破仑观念”，源于农民这个不构成有组织的阶级的阶级特征及其阶级的历史的存在必然性和局限性。马克思、恩格斯对法德农民的政治心理分析，至今对于我们研究政治文化系统整体，仍有重要启示意义。众所熟知，马克思、恩格斯在建构他们的学说体系过程中，在许多著作中，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作了系统全面的阐明。这种阐述不仅具有久远的基本理论的指导意义，而且具有政治文化研究的样本意义。

列宁在领导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民主与法制建设过程中，突出强调了在国民教育中进行政治教育的重要性。1920 年，他在全俄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发表讲话，提出“政治文化”概念，热切地期望在全俄国居民中尤其是青少年中开展政治教育，要把消除剥削阶级政治意识和政治心理，以及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落后消极的政治生活习惯、风气、情感的影响，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遗憾的是，列宁的这种对政治文化建设的政治关注，在他逝世以后长期被忽视了。今天，我们重读列宁的上述讲话，注意到他把政治文化、政治教育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具体职能提出，这是值得我们深刻领

悟的。①

此后三十多年，政治文化现象突出表现为影响深广的扩张的民族主义，是极端形式即给人类带来深重苦难、给人类文明造成巨大损伤的法西斯主义。政治文化的研究却游离开人们的视野，直至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客观上由于民主潮流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风雷激荡，主观上出于特定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需要，政治文化才独辟领域，在美国政治学界特别是比较政治学界兴起了政治文化研究热潮。1956年，加布里埃尔 A. 阿尔蒙德在美国《政治杂志》上发表了《比较政治系统》学术论文，在新时代和新形势下，重提而新论了“政治文化”问题。从此，政治文化问题被广为关注，并成为政治学研究尤其是比较政治学研究的热点课题。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专著、论文迭出新貌，并形成了不同学派及其政治文化论和研究方法。

美国政治文化研究的新兴，有其思想学术渊源，更有其现实的特定社会政治背景。

（1）美国政治文化研究热深受行为主义思潮和学术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文明的“科学”系统，出现了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各领域的扩张和渗透的学术历史趋势，它引起和带来两大方面的后果：一个后果是自然科学的许多概念和研究方法被引入到社会科学之中，实行社会现象研究“科学”化，从而不仅开阔了社会科学研究的视野，而且拓展了它的研究范围；另一个后果是出现了多学科既综合又分化的现象，从而产出了一些既非原来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亦非原来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新兴学科、学术新生儿。比如，在政治科学领域，人们不再满足于历来的研究方法——法学的、历史学的、哲学的研究方法，因为它们对政治生活、政治活动缺乏解析能力，于是自觉地将心理学、社

①《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67～368 页。

会学、人类学、统计学、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的知识和研究方法运用到政治学当中来。这样就产生了所谓相对于传统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第三思潮”——行为主义思潮和行为科学及其研究方法，其中，结构功能主义思维观照和分析方法更是特立一帜。其研究注重于政治行为、政治过程、政治生活系统。它虽存在着对政治现象的本质追寻忽视的缺陷，但它为政治科学研究方法的更新，研究领域和范围的扩展，开拓了新局面，提供了新契机。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热的形成即在行为主义思潮推波助澜之下，涌动卷起而形成气候的。

（2）政治文化热的兴起是各种思潮互相综合和相互吸新吐故的结果

对于现实政治文化的思想渊源和思想基础，不同学者有不完全相同的看法、说法。比如，加布里埃尔 A. 阿尔蒙德认为有三个来源：①马林诺夫斯基、本尼迪克特、弗洛依德等人的社会心理学、精神分析人类学；②韦伯、帕累托、杜尔凯姆的社会学；③实证主义方法。而卢西恩·派伊则认为，政治文化的思想理论受到四方面的思想影响：①孟德斯鸠、托尔维尔等人的思想和方法；②20世纪 40 年代以来社会科学技术；③20 世纪中叶人类学家对文化与人格关系的研究成果；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社会学家对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各方面人文科学研究成果。尽管有这些不同的认识，但他们都承认政治文化研究作为一个新开垦的领域，是基于继承西方政治思维的传统和吸取各项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开辟和拓展的。

（3）政治文化研究热的兴起，与美国文化战略需要这一社会政治背景密切相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 60 年代初，第三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崛起于世界舞台，它们都面临着经济发展、政治发展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在苏美两极对峙、争夺世界霸权的世界格局下，美

国出自冷战遏制战略的需要，极力向域外主要是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动宣传攻势，进行心理战，重点宣传自由经济体制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企图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引导广大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从而把它们纳入资本主义世界政治体系。美国的政治文化研究热正是适应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文化战略炒作起来的。就是说，西方学者的政治文化研究，间接地显示出当代西方国家垄断资产阶级的国际政治战略目的性。

正是在上述学术环境、思潮发展和社会政治背景下，西方学者经过多年持续地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其中较有代表性并具有国际影响的著作有：

加布里埃尔 A. 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

加布里埃尔 A. 阿尔蒙德、小 G·B·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

卢西恩·派伊：《政治·个性与国家建设》、《中国政治之精神》

卢西恩·派伊、西德尼·维巴：《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

丹尼斯·卡瓦尼格：《政治文化》

西蒙 M. 李普塞特：《政治人》

以上这些学者及其著作，研究视角不尽相同，对政治文化概念的界定也各有说辞，但他们在两点上大体上取得共识，即：（1）政治文化是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的主观意识范畴；（2）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容是人们心理上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信仰和价值，即政治心理。

基于上述共识，西方学者政治文化研究的内容范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政治价值研究，即探究政治评价取向包括人们对政治活动的客体价值判断和人们对政治活动的主观价值取向。在这方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美国学者们多打出“价值中立”的旗帜，实则推崇和力图推广美国的政治价值为人类最高的政治价值，这当然是他们的一厢情愿。

二是政治情感研究，对政治系统、政治行为、政治角色的情感是其研究的重点指向。

三是政治信仰研究，主要是指对于政治系统、政治观念、政治原则的认同与支持。

不难看出，这三个方面的研究都属于政治心理层面的研究。就他们的政治心理研究的深度、广度而言，是值得肯定的。但从政治文化系统整体而言，却不免显示出其狭隘性。

需要指出，西方学者如同其将政治结构分出若干亚政治结构一样，把政治文化也分出政治文化分布范围的亚政治文化，如从主体上分为阶级阶层的、职业的、社会集团或团体的、性别与年龄段的、种族的等等；又如从主体意识类型上分为村民的、臣民的、参与者的；还有从政治系统的存在与活动上分为体系的、过程的、政策的等等。这些亚政治文化的划分不无一定的研究意义，但在其理论上却把这些通统归入民族这一系统，却有意无意地掩盖和否认了政治文化的阶级基本分野，这既违背客观实际，又显得有些偏颇。实际上，他们对此讳莫如深，因为，上述列举的著作，无一不贯穿着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价值标尺的精神。

2. 政治文化的内涵

关于政治文化内涵的界定，西方学者们和中国学者们，各自从自己的观察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其中有共识之处，也有某些分歧。

西方学者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对政治文化内涵的界说，是阿尔蒙德和派伊的观点。加 A. 阿尔蒙德最初提出：“每一种政治系统都深入到具体的政治行动的特殊取向的模式中，这种特殊的取

向模式就是该政治系统的政治文化，而从个人角度考察，政治文化则是个人对政治及政治评估的主观取向。”后来，阿氏和西德尼·维巴在合著的另一著作中，把政治文化界定为：“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① 照阿氏的上述说法，政治文化的载体主体，一为“政治系统”，其范围当指政治统治、阶级统治系统，即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集团，其实质内容亦即一国的主导、主流政治文化，这无疑是抓住了主要之点。另一为“民族”的，即反映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政治文化。不可否认，反映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政治文化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上，确实是存在的，但是，一个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由各阶级阶层的人们组聚的共同体，民族政治文化的共性寄寓在各阶级阶层政治文化个性之中时，各阶级阶层的独自所有的政治意识的阶级性是无法抹杀的。其实，政治系统政治文化即是统治阶级的政治文化。如果从民族国家政治体系而言，除了统治阶级政治文化，必定还有被统治的各阶级阶层的政治文化的存在。至于政治文化的内容，阿氏先前所指为政治评价，后来指的是政治心理。政治评价、政治心理确为政治文化内容的组成部分，但阿氏忽略了政治文化的首要的最本质的内容——政治意识形态。而他从个人政治行为角度即政治文化的居民分布角度“考察”，政治文化在每个人身上表现的只有政治评价一点了，显然是难与实际符合的。事实上，任何时候，一国的成年居民，其政治行为首先是受某种政治思想理论原则指导和支配的，其内在的政治心理，也一定不同程度地影响其政治行为方向方式的选择。由此可见，阿氏的界说是有局限性的、不完整的。

卢西恩·派伊则指出：“政治文化是给予政治历程以秩序和意义、给予政治系统中占支配地位的行为以基本假设和规则的一套

①《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年版，第 29页。

态度、信仰和感情。”[①] 卢西恩·派伊倒是明确地把政治文化指定在统治集团层次，其内容则包括：政治规范（秩序）、政治意识（意义）、政治目标（假设和规则），以及政治心理（态度、信仰、感情）。他没有注意到的是政治评价，以及没有从社会结构的各层面上进行政治文化的居民分布分析。因此，卢西恩·派伊的政治文化内涵界定虽较阿尔蒙德的界定更可取，然而也没有达到完整的、准确的要求。

尽管如此，西方学者对政治文化内涵的界定和研究，在政治学研究上还是有其不容忽视的意义的。从人类在 20 世纪百年间的历史大过程看，人类史上的一个重要新光点是新人文主义思潮的勃兴，它使全部人文科学把人们的主观认知推向人的本在的、内在的深层。主要是在西方，西方又主要是在美国， 20 世纪以来政治科学研究同其他人文科学一样，走过了一条从外在于人到内在于人的发展道路，政治日益以人为本体，与人自身紧密联系起来。如王沪宁所说，西方政治学从古代希腊到 20 世纪 40 年代，是从政治与道德、与上帝、与自然法相联系走向了政治与人的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把政治看作是受人们行为制约的现象，是人类在探知政治现象方面一个相当重要的进步”[②]。就是说，西方学者对政治文化内涵的界定和研究，把人们对政治现象的认知和探究推向人的内在深层次，推向人的政治行为的心理导向主观因素，推向人类政治智慧对人自身的开发，不独是西方政治学的一大进步，而且是对人类的一大贡献，是整个人类政治文明具有未来学意义的重大发展。从政治哲学意义上说，人们在很长时间里只注意客体对主体的意义，却忽略了甚至漠视主体对客体的意义。西方学者政治文化研究的创新意义，正在于他们基本上克服了这

①《政治发展面面观》，波士顿小布朗公司 1966 年，第 104 页。

②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07～308 页。

一缺欠，从而改变了不仅是政治学者而且也是政治家们的传统政治思维定势和逻辑思维模式。当然，他们的政治文化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对人的主观意识作用特别是政治心理的功能有些夸大；以西方价值为标准带有明显的美国民族优越感和主观片面性；以西方社会的人格与心理作为衡量尺度，从而显示出明显的视界的偏狭等。

中国的政治文化表现始于西周的周公，这有《尚书》以及先秦诸子述论及周公政治意识的众多典籍足资证明。春秋至战国形成儒墨道法四大显学的政治文化系统，现都有他们遗存的典籍在，可供人们去作历史的和现实传承的探究。而自汉代以降以迄明清，儒家的孔孟之道和道家的老庄之道形成两大道门，长期影响着历代历朝的治国安邦的政治实践、政治行为。其中，儒家民本主义政治文化自始即表现出对民众政治心理倾向和作用的注重。孔孟不厌其烦地讲“得民心者得天下”；《吕氏春秋》视“顺民心”、“审民心”为政治成败得失的关键；宋明理学、心学都无不对人们的政治心理极为关注和反复论说。这表明，中国人对人们的政治心理及其作用的重视是由来已久的，而且形成了一种哲学意念上的政治文化传统。只是由于大部分时间与世界隔绝和科学的不发达，以及自然与社会具体条件的制约，对于政治文化，我们的古圣先贤还不可能，因而也就未能形成完整的概念和系统的理论体系。

中国近代现代史上，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剧烈变化，中国思想学术界关于国粹主义和“西化”的文化论争时伏时起，其中也涉及到政治文化方面的问题，甚至孙中山还提出了“历史的重心在民心”的深具政治哲学意蕴的观点，但整个政治科学没有发展起来，更谈不到专门对政治文化的研究。及至新中国成立，中国思想学术界失去了发展政治科学的契机，政治学研究中断停止了近30年。改革开放伊始，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中央召开的理论

务虚会上提出政治学“赶快补课”①。1980 年 12 月，成立中国政治学会，我国政治科学研究才走上了新兴之路。改革开放的大潮，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促进了政治学的发展，政治统治系统的政治文化建设和公民政治文化建设问题日益凸现出来。特别是在党政领导干部和广大公民大众两个层面，解决政治心理素质提高和政治人格再造的问题日显迫切。这样，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直至当前，中国学术界以政治学界为主，也包括社会学、历史学、哲学各界，在文化大讨论中，掀起了政治文化研究的热潮，并有若干专论和论著奉世。这中间，如何界定政治文化的内涵，迄今仍有争议，还有待达成共识。大致概括起来，有以下四种观点。

（1）广义说

此说认为，政治文化的内容不仅包括政治态度、政治情感等政治心理方面，而且也包括着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朱日曜教授即主张：“政治文化应该包含有与政治相关的各个层次的文化。”他认为，政治文化有三个相互联系的层次，即“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与社会政治心理”②。这种政治文化概念的广义说，在 80 年代曾有一定影响，有的学者（例如辽宁师范大学刘承学教授）据此把政治文化分为“制度形态”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政治文化两大部分。实际上，“制度形态”政治文化是居于政治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政治文化的制度化、规范化，从社会结构角度视之，它处于主导地位且具有普遍的约束约制力，是不能从一大组成部分看待的。

（2）狭义说

狭义的政治文化概念观点把政治文化理解为政治的主观方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80～181 页。

②《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吉林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4 页。

面，其内容既包括政治心理、政治价值，也包括政治思想。如果界定政治文化的内涵，政治文化是一定民族和地区的人们在长期社会生活中积淀而成的，持久影响人们政治行为的政治心理、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总和。① 南开大学刘泽华教授也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中的主观因素，是政治思想、政治信仰、政治观念、政治价值标准、政治意识和政治心理的总和，它的表现形式有理论形态，心理趋向和情感倾向等。’② 这种狭义说的政治文化概念为多数学者所接受，但在政治文化的内容结构上，对于政治心理、政治思想的结构层次地位，还存在不同的认知侧重。

（3）最狭义说

持这种最狭义政治文化概念观点的学者，把政治文化的内容仅仅限定于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亦即政治文化即政治心理。北京大学谢庆奎教授就是持这样的观点。他认为：政治文化就是政治体系的政治心理，包括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所共有的政治态度、信仰、情感、价值等。这种最狭义说，大体上是与西方政治文化论“对接”的，也是与其对政治文化内涵的界定基本上一致的。显然，它对推动特定民族政治心理的深入考察和研究不无意义，但是，它割弃政治心理与政治思想特别是与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念的深刻联系，未必符合实际，因而也是不完整的。

（4）阶级主体说

有些学者，从政治文化以人为载体的角度揭示政治文化的内涵，认为不论历史上还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任何具体内容的政治文化，都是一定阶级局面下的受政治结构制约或影响的政治文化，阶级主体性是政治文化的本质特征。因此，他们认为：“政治

①徐大同、高建：《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和特征》，《天津社会科学》986年第5期。

② 《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文化是一定阶级在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形态下，特定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对现实政治体系及其各个组成部分的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心理和政治评价的总和，它对人们的政治行为方向、方式和方法起导向和约制作用。’[①] 我们认为，这种阶级主体说把握了政治文化现象的“内部联系性”，是可取的。当然，前边的三“说”也有相当的参照意义。

以上四种观点，各有道理。我们的中西政治文化传统对比分析，将基于“阶级主体”，同时参照上述三“说”来分解展开。

二、政治文化的特性

在阶级社会里和还存在阶级差别与局部阶级斗争现象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政治文化以阶级性为主导标识，具有多方面的特殊性质，呈现出多种多重分野的色彩。简略地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说明和分析。

1. 政治文化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一定的政治文化是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及其社会条件下生成和发展起来的，但是，任何民族国家都是在经济上从而也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国家（国家政权机构），因此，一定的政治文化是一定阶级（或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心理和政治价值观念（表现为政治评价）的总和，而且，反映特定阶级的阶级性格和品格。不需举例证明就可以知道，在存在两

①邵德门、赵连章、刘彤：《政治学新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73 页。

大基本对立、对抗阶级的社会里，如封建阶级与农民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就分别有封建阶级的政治文化，农民阶级的政治文化，资产阶级的政治文化，无产阶级的政治文化，以及与基本阶级存在同盟关系的其他各个阶级的政治文化，绝然不存在超阶级的政治文化。超越阶级界限的政治文化有没有呢？有的。但是，这种“超越”，并不是“超阶级”，而是两个或几个阶级基于本阶级利益而在政治文化的某一方面（例如政治心理、政治价值观念），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和历史长河川流不息的流淌中，达成的共识，而且在这种“共识”中包含着各个阶级对这种“共识”的各自的理解。一个阶级内部会有不同的阶层，可能有不同的政治派别，相应地也会有不同阶层、不同政治派别的政治文化表现。然而，这些阶层或派别的政治文化表现，是一个阶级的政治文化总体的阶层性、派别性差异，是阶级同质同源的异构异流。这种情形，从古至今都是如此。

国内外一些学者认为，政治文化的特性首先是民族性，这是未必合乎历史实际与现实实际的。诚然，就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而言，即使同属一个阶级性质的政治文化，也一定会具有各自民族的特色，例如，在古典政治学说史上，孔子政治学说不同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说，近代史上西方政治学说，洛克、卢梭、孟德斯鸠各具特色。同样，同属无产阶级政治学说，马克思主义不完全同于列宁主义，列宁主义又不完全同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政治学说。这其中，除了民族特色、具体国情，还由于时代特征、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因此，我们认为，民族特色不等于民族性，而且民族特色与阶级性相比，它是非本质的外部的特征，或者说是各阶级、阶层共识那部分共性集合特征。总之，在政治文化领域，阶级分野是最基本的分野。古今一以贯之的民族精神是有的，但这种民族精神在不同时代甚至不同年代，都被赋予统治阶级的思想导向和时代特征。那种贯古通今，上下几千年

全民族或各个民族成员普遍一致完全认同、接受的内容始终如一的“民族政治文化”是不存在的。事实上，在阶级社会和还有阶级的社会里，政治文化的发展，既有潜移默化状态，也有激扬飞奋状态。它有时间接的有时直接的反映、表现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在国际范围内，既有政治文化的自然的交流，学术的交换，也时有国际政治斗争在政治文化上的突出激烈的反映和表现。

至于政治文化分析，阶级分析不是惟一的，当着分析本国或别国的政治文化的历史状况和现实状况时，要充分考虑到民族特殊性即民族特色。例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文化的总概念，把这个文化总体分为帝国主义文化、半封建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相应地我们可以说那时有帝国主义政治文化、半封建政治文化、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从而把旧中国政治文化状况与别的国家的政治文化状况区别开来。但是，这样的政治文化分析，是基本上以阶级分析为基础的，并没有也不应该从民族特殊性得出存在贯通古今的“共同民族政治文化”的结论。

从民族特征来说，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心理素质是民族的稳定的特征之一，基于共同文化上的民族心理素质对于各个阶级的政治认知、政治思维方式、政治情感、政治生活习惯当然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具有同一民族心理素质的各个阶级的人们，往往会有不同的甚至截然对立的政治价值观念和政治行为目标。归根到底，这是因为他们的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心理、政治评价标准，有着不同的阶级属性，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其物质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不同。我们承认政治文化有民族特色，却不能同意民族性是政治文化首要特征的说法。民族特色可以反映在各阶级政治文化上，然而，民族特色绝然掩盖不了也消弭不了各个阶级政治文化的特定内容。用“民族性”或“民族主体性”掩盖阶级性、“阶级主体性”，是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学者们几百年

来未能摆脱的政治思维定势，有些人在有些时候，这是他们采用的一种骗人手法。如同他们打出“ 中性价值 ”那张牌一样，“ 民族性 ”也是一张虚张声势的牌。

2. 政治文化具有历史性和时代特性

政治文化是历史范畴，具有历史性和时代特征。就是说，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形态、不同政治制度下和在不同国度里，以及一种社会形态政治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政治文化状况。在此，我们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为例，足以说明。

中国古典政治学说发端于周公，创立于孔子之时。政治文化的发展，在春秋战国时代，由诸子百家争鸣而大兴。其时，儒墨道法四大显学各执一说，而以儒法两家争时代的主流。各国变法运动的历史大势，凸出了法家政治文化的作用，形成“ 法显儒隐 ”的态势和局面。至秦王朝建立，实现统一，确立了法家政治文化统治地位，并把它的政治思想规范化，政治与法律制度化。秦朝的速亡，没有动摇宗法封建集权专制的体制，而由汉代承传下来。至汉武帝时，实际上儒法合流在“ 独尊儒术 ”旗帜下，兼采众家，从此确立了儒家政治文化的正宗地位。然而，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所谓孔孟之道的政治文化面貌几经改换，其间还有佛教宗教政治文化的影响，到清代末年已今非昔比。它同孔子的政治文化乃至汉代政治文化，已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差别。到了中国近代，儒家传统政治文化中，其与时代不合拍的部分，例如专制制度、家长制、官僚主义、特权观念等等仍有严重表现，其作为民族传统精神部分，例如为国为民的发愤图强、自强不息等意识，主张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整体观念，德治、举贤、隆法重纪等等，被传承和弘扬起来，融入新时代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之中。封建主义政治文化演化为半封建政治文化，它既承受不

起西学的冲击，也与大众政治文化特别是人民大众 昅思‘ 变 世 ’的政治心理相冲突。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进中国，同中国社会、中国革命、中国民众相结合，乃酝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革命传统政治文化。

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文化在近代的发展而言，文艺复兴时期，酝酿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总其传统政治文化之大成，由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由两次世界大战到当代，到迈向 21 世纪，西方政治文化有着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的表现形态。仅从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思潮来说，其变化、变迁之大，令世人目不暇给。

由此可见，政治文化作为历史范畴，是历史地反映不同时代、不同时期的风云变幻的。西方思想家以所谓“ 传统社会 ”和“ 现代社会 ”为标准，划分东方西方政治文化，是不公正的。因为，讲传统，西方有西方传统，中国和东方有中国和东方的传统。至于“ 现代 ”，有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之别。把资本主义自诩为“ 现代社会 ”，贬斥发展中国家仍处在“ 传统社会 ”落后阶段，是西方思想家的偏见。他们企图以西方政治文化模式改变发展中国家政治文化的内容使之向“ 西化 ”发展，实际上正好透露出西方国家强权政治的政治文化霸权倾向。这是无论如何不能令人接受的。

至于说到政治文化的历史性，还必须看到和承认政治文化的历史更替，批判继承，以及对域外政治文化的借鉴。但是，这种继承或借鉴，一是现实选择须符合主体需要和适应新时代的潮流，譬如，中国古代儒家主张“ 和合 ”精神，与现时代的“ 和平 ”、“ 和平共处 ”观念的在新时代条件下的融溶。二是借鉴域外政治文化的某些内容，要与一国的国情相适应，譬如，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个性自主独立、自我价值、人权等等，在社会主义原则下，借鉴来赋予其一国内需的涵义和特色。要而言之，不论本

国继承还是从外部吸收借鉴，总是现实政治文化处于选择的主导地位，并且受意识形态自身发展规律的制约，即本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批判继承和外来政治文化的吸收借鉴，总是要融会到现实的新政治文化之中，或者说，现实政治文化的创新、面向未来的发展，是在剔除中外传统政治文化的糟粕，纯然是历史陈迹的部分，吸收其“民主性精华”部分，纳入新政治文化之中融为一体。不论中国或外国，在现实生活中，必定有传统政治文化的某些方面的表现，但绝对不会有单独存在的传统政治文化系统。就本土政治文化和域外政治文化关系而言，本土政治文化处于选择主导地位，它不论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都不是简单地一概排斥域外政治文化中可以吸收、借鉴为己所用的东西，但绝不会也不可能因而也不应该全盘吸收。如同全盘否定本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肯定本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国粹主义是不可取的一样，全面排外的封闭锁国和全盘西化的崇洋媚外，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两个方面，都是违背政治文化发展的时空制约规律的。

3. 政治文化具有社会结构性

政治文化与一般文化现象不同，它与政治生活息息相关、紧密相通，具有明显的社会结构性和社会分化的界限。在阶级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每一社会制度下的政治文化，从社会结构总体上看，都可以分为三个基本的部分，即主导政治文化、非主导政治文化和敌对性政治文化。前二者我们可以称之为主文化的政治文化，后者为反文化的或反社会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的社会结构性，在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是无一例外的存在的。

主导政治文化是以统治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为指导并居于统治地位的政治文化。它是以统治阶级的思想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规定着并不断适时地改变着体现于政治制度中的基本规范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